

# 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 及其不遇的原因

呂春盛\*

## 摘要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一般可略分為北來之僑人、南方之吳人，以及南方土著之原住民，其中僑人長期高居統治地位。不過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之為「晚渡北人」者，身分地位頗為特殊，他們雖可歸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但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他們起初多以軍事立功，被稱為「將門」，東晉政權多賴早期南渡京口的北府兵軍團相維繫，而南朝諸政權則與晚渡壽陽、襄陽之將門共浮沈。

「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以往學界對「晚渡北人」的問題，雖有散篇、個別的探討，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對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做全面性的研究，包括分析《晉書》列傳中所有南渡北人的基本資料，考證「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年代及背景，整理出史傳所見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人物表，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晚渡北人」在東晉時期的動向，以及他們在東晉政壇上普遍不遇的原因。至於南朝時期的「晚渡北人」，因為與東晉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在政權興衰中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擬另文討論。

**關鍵詞：**東晉、晚渡北人、荒僮、僑姓、永嘉之亂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約略可分為三，一是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僑人，二是永嘉之亂前已定居江南的漢族，稱為吳人，三是蠻、獠、溪、俚、越等非漢族的南方土著。<sup>1</sup>自東晉以來，僑人掌握政權，長期在政治社會上居最高的統治地位，吳人次之，而蠻、獠、溪、俚、越等非漢族的南方土著族群，則長期處於被壓抑的地位。以上這種族群政治的格局，直到梁末侯景之亂、陳朝建立才有重大的變動。<sup>2</sup>然而以上的族群政治，若再留意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為「晚渡北人」者的特殊性，則東晉南朝的政治史將更為精彩。

所謂「晚渡北人」，即永嘉之亂後較晚南遷的北來僑人，他們雖亦歸類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東晉南朝的「晚渡北人」，雖然在政治、社會上遭受歧視，卻在東晉、南朝政權興亡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如蕭道成在淮陰興起，即憑籍不少晚渡北人豪族之支持，<sup>3</sup>而梁武帝蕭衍在雍州舉兵，則多賴襄陽地區「晚渡北人」之武

<sup>1</sup> 周一良把東晉南朝境內的人群做以上的分類，呂春盛則將此分類概念稍做修改，擴大成為東晉南朝境內「族群」的分類。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昆明，1938.12），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0-93；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第一章「導論」〉，頁5-13。

<sup>2</sup> 關於東晉南朝族群政治的基本格局及其變動，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53；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四川南溪，1943），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第12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202-214；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頁73-118。

<sup>3</sup> 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1篇〈楚子集團與江左政權的轉移〉，頁183-185；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3），第7章〈南齊高帝の革命軍團と淮北四州の豪族〉，頁307-333；羅新，〈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收於陳少峰主編，《原學》第一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頁147-175。

力。<sup>4</sup>

儘管「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史上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學界直接以「晚渡北人」為主題的研究，管見所及僅只有以下數篇。1991年陳琳國發表〈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sup>5</sup>主要探討河東裴氏、柳氏、京兆杜氏、韋氏南遷襄陽之後在南朝的發展情形。該文雖提綱挈領地論述了襄陽晚渡士族在南朝的興衰，頗有可觀，但仍難免有過於簡略之憾。1994年板尾典隆〈梁代の政治と「晚渡北人」〉，<sup>6</sup>應是學界關於「晚渡北人」的第一本碩士論文，唯該文主要以流寓襄陽的韋氏、杜氏、柳氏為重點，尚未通盤討論「晚渡北人」的議題。2009年胡寶國發表〈晚渡北人與東晉中期的歷史變化〉，<sup>7</sup>此文的重點並不在「晚渡北人」於東晉時期的活動情況，而是考察「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當與早渡僑人的第二代已逐漸認同於南方文化有關。胡氏之說頗值得參考，只不過其對「晚渡北人」的形成，似乎過於偏重文化因素。

由上可見，目前學界對「晚渡北人」的研究多偏重於南朝時期，且只有零星散篇的個別探討，無論廣度、深度都還有努力空間。筆者認為，比起東晉時期，南朝時期的晚渡北人在政權興衰中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關於南朝時期的「晚渡北人」擬另文討論，本文則先將重點放在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全面分析史書列傳中南渡北人的資料，考察「晚渡北人」概念形成的時間及背

---

<sup>4</sup> 參見越智重明，〈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軍事史學》，9（東京，1967.5），頁21-41；前引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8章〈梁武帝の革命と南朝門閥貴族體制〉，頁335-381；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1篇〈楚子集團與江左政權的轉移〉，頁185-186；李天石，〈蕭衍覆齊建梁考論〉，《江蘇社會科學》，2（南京，1999.3），頁109-115；李天石，〈蕭衍雍荊軍事集團的形成及其覆齊建梁的成功〉，《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2（南京，1998），頁119-123；呂春盛，〈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77-110。

<sup>5</sup> 陳琳國，〈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4（北京，1991.8），頁20-27。

<sup>6</sup> 板尾典隆，〈梁代の政治と「晚渡北人」〉，《龍谷大學大學院研究紀要・人文科學》，15（京都，1994.1），頁217-219。

<sup>7</sup> 胡寶國，〈晚渡北人與東晉中期的歷史變化〉，《北大史學》，14（北京，2009.12），頁94-111。

景，羅列史書所見東晉時期「晚渡北人」人物表，以追察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動向，並分析其在政治上不遇的原因。

## 二、永嘉之亂後的南遷浪潮

東晉南朝史上為何會有「晚渡北人」？所謂的「晚渡」是指何時之後？「晚渡北人」在東晉政壇上為何難於嶄露頭角？這一系列問題，都應從永嘉之亂後的南遷浪潮來考察。學界對永嘉之亂後的人口遷徙已有許多研究，<sup>8</sup>本節著重於論述各階段南遷流民潮的特色，做為考察「晚渡」年代問題的基礎。

關於永嘉之亂後的流民南遷浪潮，譚其驥〈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sup>9</sup>可謂近代開創之作，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第五章第二節，<sup>10</sup>與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第十章〈永嘉之亂後的人口南遷〉，<sup>11</sup>則是其後較詳盡的綜合之作。茲參考學界成果綜論如下。

西晉末年政局動亂之後，人民就四處流散，尤以懷帝永嘉元

---

<sup>8</sup> 參見譚其驥，〈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15（北平，1934.6），頁51-76；周一良，〈乞活考—西晉東晉間流民史之一頁〉，原載《燕京學報》，37（北京，1949.12），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12-29；夏日新，〈永嘉亂後北方民戶的大流徙〉，《社會科學》，1989：6（蘭州，1989.12），頁95-100；楊洪權，〈兩晉之際士族移徙與「門戶之計」淺論〉，《武漢大學學報》，1998：1（武漢，1989.2），頁106-111；黃云，〈魏晉流民及流民策〉，《福州師專學報》，21：6（福州，2001.12），頁68-71；劉新光，〈晉永嘉亂後南遷流民地域選擇述論〉，《南京曉庄學院學報》，18：3（南京，2002.9），頁31-36；劉雅君，〈論流民與兩晉之際的政治格局〉，《貴州文史叢刊》，2002：3（貴陽，2002.9），頁12-16；張琳，〈東晉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問題〉，（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中村圭爾，〈東晉時期揚州的流民問題及其歷史意義〉，收於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176-187；方高峰，〈兩晉南朝時期北方流民南下與南北漢人融合述論〉，《西北師大學報》，44：4（蘭州，2007.7），頁99-103；孫志剛、張琳，〈東晉南朝源出流民的情況及其原因分析〉，《青海師專學報》，2008：5（西寧，2008.10），頁58-60；馬曉瓊，〈東晉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響〉，《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5：6（樂山，2010.6），頁94-97。

<sup>9</sup> 譚其驥，〈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頁51-76。

<sup>10</sup> 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345。

<sup>11</sup> 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307-387。

年（307）之後，華北人民更像潮水般越淮渡江，直到南朝時期尚未終止。唯較大規模的南遷浪潮，乃可略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西晉永嘉元年至東晉太興三年（320）。琅邪王司馬睿移鎮江東，北方大饑，胡族攻陷洛陽、長安，「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sup>12</sup>晉朝的宗室貴族、文武大臣、世家豪族大多在這一時期舉族南遷，<sup>13</sup>成為支持東晉政權的僑姓士族，<sup>14</sup>其中著名人物多見於《晉書》列傳之記載。

第二階段是東晉太興四年（321）至東晉永和四年（348）。東晉北伐將領祖逖病死，郗鑿、祖約所率之北伐軍撤退，晉朝北界退至淮河一線，淮北居民或原來避亂淮北的難民再渡淮南遷，不久蘇峻、祖約內亂，百姓又紛紛渡江。《宋書·州郡志》揚州條：「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sup>15</sup>咸和四年（329）蘇峻之亂平息後，邊境小規模的南遷仍時有發生，但大規模的南遷基本停止。<sup>16</sup>東晉政權也在此後穩定下來。

第三階段是東晉永和五年（349）至東晉太元七年（382）。永和五年石虎病死，後趙政權崩解，許多華北士民趁機南遷，隨後東晉桓溫三度領軍北伐，曾直逼長安，洛陽收而復失，退兵時不少當地民戶亦隨之南返。《宋書·州郡志》雍州條：「胡亡氏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帝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sup>17</sup>相較於前兩時期南遷人民偏重於遷入江左、淮南，此時期南遷人民則多遷入長江中上游或漢水流域。

第四階段是東晉太元八年（383）至東晉義熙四年（408）。

<sup>12</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65，〈王導傳〉，頁1746。

<sup>13</sup> 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二卷》，頁314-315。

<sup>14</sup> 田餘慶對僑姓士族成為東晉政權的主要支柱有很深入的考察，參見氏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王心揚則對僑姓士族在東晉政權的政治性格有所論述，參見氏著，《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sup>15</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35，〈州郡志〉揚州條，頁1033-1034。

<sup>16</sup>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頁321。

<sup>17</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37，〈州郡志〉雍州條，頁1135。

淝水戰後，苻堅敗亡，黃河流域再度陷入各族的混戰，中原流民相率渡江，其中還包括數萬前秦之俘兵、<sup>18</sup>官員甚至宗室族人。<sup>19</sup>

第五階段是東晉義熙五年（409）至劉宋永初二年（421）。劉裕北伐，義熙五年出兵攻南燕，次年滅南燕，攻克其都城廣固，「沒入家口萬餘」人，<sup>20</sup>加上其他降俘，估計有二、三萬人被遷回南方，許多華北豪族亦率部曲來降。義熙十二年（416），劉裕再度北伐，滅後秦，次第收復河南、關中，但劉裕東歸後，夏主赫連勃勃攻長安，關中復失，大量流民隨之南遷，其中包括許多關中、河南地區的豪族，率大批宗族南遷。<sup>21</sup>另外尚有部分後秦姚氏宗族亦於此時被遷於江南，<sup>22</sup>西域康居康氏西晉時遷入藍田，此時姚萇河南尹康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南遷襄陽之峴南。<sup>23</sup>

第六階段是劉宋永初三年（422）至劉宋泰始五年（469）。永初三年宋武帝劉裕死後，北魏來攻，宋失河南、淮北之地，流民又多南渡。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大舉南侵至瓜步，大批流民南渡江淮。元嘉二十八年（451）十一月，「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西流民於姑孰，合萬許家」。<sup>24</sup>景和元年（465），晉安王子勛起兵，導致北魏再南侵，至泰始五年（469），宋的青、冀、兗、徐和豫州的淮西完全喪失，大量人口南遷。<sup>25</sup>這一時期南遷者，有許多青徐豪族後來成為支持蕭道成的武裝力量。<sup>26</sup>

<sup>18</sup> 《晉書》卷9〈孝武帝紀〉載太元十四年（389）：「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頁237），按從可設兩縣的規模看，人數估計近一萬，而此時已是淝水之戰後五年，分散安置及自行定居的降俘當更多。參見葛劍雄《中國移民史》，頁326。

<sup>19</sup> 《晉書》卷114〈苻堅載紀〉載前秦敗亡後，苻堅子苻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僚逃散」（頁2928），其後轉道漢中投晉。參見葛劍雄，《中國移民史》，頁326。

<sup>20</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卷115，〈晉紀〉義熙六年條，頁3627。

<sup>21</sup>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2，〈趙逸傳〉，頁1146。

<sup>22</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19，〈姚泓載紀〉，頁3017。

<sup>23</sup> 唐·姚思廉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18，〈康絢傳〉，頁290。

<sup>24</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5，〈文帝紀〉，頁100-101。

<sup>25</sup>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頁333。

<sup>26</sup>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南齊書札記·南朝東南內地之位置〉條，頁231-234；羅新，〈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頁160-175。

大體言之，南遷浪潮第一階段是在永嘉喪亂後，第二階段是在蘇峻之亂後，第三階段是在後趙敗亡與桓溫北伐失利之後，第四階段是在淝水之戰後，第五階段是在劉裕北伐後，第六階段是在劉宋與北魏交戰後。第一階段至第五階段大致屬東晉時期，第六階段則是屬劉宋時期。劉宋泰始六年以後，除個別政治鬥爭失敗者，以及邊境地區的災民外，已少見大規模的南遷浪潮。<sup>27</sup>

### 三、東晉時期「晚渡北人」概念形成的時間與背景

永嘉之亂後的大規模南遷浪潮如上，那麼，所謂的「晚渡北人」到底是指何時之後的南渡者？而這種早渡、晚渡的區分又是在何種時代背景下成立的呢？

最早記載「晚渡北人」之例，可能是《晉書·楊佺期傳》：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沈勇果勁……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sup>28</sup>

如楊佺期因其父楊亮「晚過江」而被排抑，一般認為即所謂的「晚渡北人」。而楊亮「歸國」之事，《晉書·姚襄載記》載：

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sup>29</sup>

《資治通鑑》繫此事於穆帝永和十二年（356），<sup>30</sup>是時距司馬睿

<sup>27</sup>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頁335。

<sup>28</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4，〈楊佺期傳〉，頁2200。

<sup>29</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16，〈姚襄載記〉，頁2964。

<sup>30</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00，〈晉紀二十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八月條，頁3157。

即位稱帝（317）已 40 年，約當東晉中期，據此，東晉中期過江的北人已屬「晚過江」者。<sup>31</sup>

如前節所述，第一階段南渡的主要人物，多為永嘉喪亂後的西晉宗室、貴族，後來成為東晉政權核心的僑姓士族。第二階段南渡者，多為祖逖北伐失利與蘇峻之亂後，招引淮北居民或原來避難淮北的難民再渡淮南遷者，《晉書》中已少見此類人物的記載。第三階段南渡者，多為後趙敗亡、桓溫北伐失利之後南渡者，此時期東晉政權已進入穩定時期，權力組織已告確立，且相對於前二階段，南渡者多為胡族政權瓦解之後的新難民，因此「晚渡北人」的概念在此時形成是很合理的。不過此處應留意北人之避難南渡，有渡江，有渡淮，還有留居淮北、襄陽一帶者，因此「晚渡北人」之「渡」，不應囿指渡江。

《宋書·杜驥傳》載「晚渡北人」又被蔑稱為「儻荒」、「荒儻」：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劉裕）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儻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sup>32</sup>

《資治通鑑》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七月，亦記此事云：

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儻荒遇之。<sup>33</sup>

按《宋書·杜驥傳》「儻荒」亦作「荒儻」，《通鑑》胡三省注云：「南人呼北人為儻。荒，言其自荒外來也。」<sup>34</sup>余嘉錫曾詳考「荒儻」語意之複雜及轉變，指出「荒儻」在東晉初年乃吳人輕侮北

<sup>31</sup> 參見胡寶國，〈晚渡北人與東晉中期的歷史變化〉，頁98。

<sup>32</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65，〈杜驥傳〉，頁1720-1721。

<sup>33</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24，〈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七月條，頁3927。

<sup>34</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24，〈宋紀六〉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七月條，頁3927。

人之語，後來却轉變為早渡僑人歧視晚渡者之語。<sup>35</sup>胡寶國則認為，歧視「晚渡北人」為「荒僮」者，乃是永嘉初年南渡的僑姓第二代人物，這是因為早渡僑姓的第二代人物，或幼年即過江，或生於江南，對他們來說，南方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故鄉，北方最多只有朦朧的記憶，甚至連朦朧的記憶都沒有，因此他們對新到的北人缺乏認同感，所以才學著吳人的腔調蔑稱後來者為「荒僮」。胡寶國又認為，僑姓第二代人物生長於南方、受南方文化影響，已能純熟地使用吳語，喜愛並模仿創作江南民間流行的吳歌、西曲，信奉南方的天師道，因此僑姓第二代人物對「晚渡北人」的不認同，說到底是對北方的不認同，而「晚渡北人」的形成正反映出南人、北人在文化上融合的開始，這正是東晉中期最富有歷史意義的地方。<sup>36</sup>

上述胡寶國之論頗值得參考，但仍有可商榷之處。胡氏說僑姓第二代人物對「晚渡北人」的不認同，到底是對北方的不認同，似言過其辭。過江之初，元帝對南方曾有「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之嘆，<sup>37</sup>蘇峻之亂後，建康殘破，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都被王導斥責為「竄於蠻越」，<sup>38</sup>這些東晉初期北人不認同於南方之例暫且不說，即使到東晉中期北人相聚，仍多以中原文化相尚。何啓民曾論東晉的學風，認為江南吳人的學術思想本來仍固守兩漢經學，王導卻大力提倡北方新潮的清談玄學，使南渡之士感到南方新天地無殊於中原，而能從心靈上安頓下來，並使北方新的中原文化真正在江南生根。<sup>39</sup>田餘慶論東晉中期的文化，亦指出永和年間（345-357）安定的政局，「使浮沈於其

<sup>35</sup> 關於「荒僮」語意之複雜及轉變，參見余嘉錫，〈釋僮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冊（南京，1948.12），頁47-52。該文後來收入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史叢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173-178。

<sup>36</sup> 胡寶國，〈晚渡北人與東晉中期的歷史變化〉，頁94-111。

<sup>37</sup> 劉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見於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上卷，〈言語第二〉，頁91。

<sup>38</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65，〈王導傳〉，頁1751。

<sup>39</sup> 何啓民，《魏晉思想與談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頁189-196。

間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閒適。他們品評人物，辨析名理」，留下許多佚聞佚事，形成永和歷史的一大特點。<sup>40</sup>顯示以清談玄學為主的北方新潮文化仍是當時的主流。如此，要說此時僑姓第二代人物已對北方不認同，確實是過甚其辭，即使北人開始喜好江南文化，那也才在開始階段，還談不上到「認同」的時候。在文化因素上，應只能推論僑姓第二代因沾染南方吳俗，因而使其與晚渡者有文化上的差異，從而促成「晚渡北人」的分野。

僑人第二代對晚渡北人的輕視，還可能來自生活地域上的成見。余嘉錫在前引對「儻」字的考察中，認為「儻」指鄙野不文之人，原無地域之分，但自三國鼎峙，南北相輕，吳人罵江、淮之間的楚人為儻，後來更罵中國人為儻，東晉初吳人猶呼北方士大夫為儻父，<sup>41</sup>可見儻字漸漸帶有地域偏見的成分。周一良曾認為「晚渡北人」被視為荒儻，與其南渡後定居之地域有關，蓋當時晚渡者多定居於江北甚或淮北一帶，屬於所謂儻楚之地。<sup>42</sup>周氏此說頗富啓發，蓋查諸史文，被罵為儻者似多為定居於江北甚或淮北一帶的晚渡者，如前述被視為荒儻的杜坦南渡後定居彭城或襄陽，<sup>43</sup>劉宋時南渡的王玄謨被孝武帝譏為「老儻」，其定居地為徐州，<sup>44</sup>淮西人賈元友勸宋明帝北伐，被豫州刺史劉劭批評為「儻荒遠人，多干國議」，<sup>45</sup>以上被譏為儻者定居地皆在江北，而「晚過江」的楊亮、楊佺期父子，雖受排抑，但史文未見其被罵為儻。若此說可成立，「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儻荒遇之」之說，<sup>46</sup>可能是由於晚渡者多留居江北，故而承襲南方口語而來的概括性說法，

<sup>40</sup> 田餘慶，〈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北伐問題〉，收於氏著，《東晉門閥政治》，頁173。

<sup>41</sup> 余嘉錫，〈釋儻楚〉，頁173-175。

<sup>42</sup>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宋書札記·晚渡北人〉條，頁190-192。

<sup>43</sup> 周一良認為杜坦南渡後定居彭城，王力平認為杜坦南渡後定居襄陽，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宋書札記·晚渡北人〉條，頁191；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統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第三章〈郡望分立的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杜氏家族〉，頁71。

<sup>44</sup> 《宋書·王玄謨傳》載：「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推測王玄謨南渡後應定居於徐州。南朝梁·沈約，《宋書》，卷76，〈王玄謨傳〉，頁1973。

<sup>45</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86，〈劉劭傳〉，頁2195。

<sup>46</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65，〈杜驥傳〉，頁1720。

並非所有晚渡者皆被為視為僞，是以早渡者對晚渡者的歧視，恐亦與畛域之見有關。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應重視的是涉及政治忠誠與門第文化的因素。《晉書·楊佺期傳》載楊佺期被歧視的原因為：「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sup>47</sup>其中的重點在「婚宦失類」，亦即楊氏雖曾為中華高門，但由於楊亮「少仕偽朝」乃「婚宦失類」，而有失其身為高門之身份。如前所述，「晚渡北人」概念形成的時間大約是在東晉中期，亦即南渡浪潮的第三階段以後南渡者，即被視為「晚渡北人」，這批晚渡者在永嘉之亂時不論是來不及南遷，或是心存觀望，普遍都因留在北方淪陷區，或仕宦於胡族「偽朝」，甚至與胡族聯姻，而有「婚宦失類」的問題。除楊佺期之例外，又如北地泥陽傅暢，西晉末為秘書丞，「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sup>48</sup>其子傅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sup>49</sup>太原祁人王懿，「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為二千石」，苻秦敗亡後起兵歸晉。<sup>50</sup>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蓋永嘉喪亂後，江左建康新政府已成為正統之所在，而這種正統王朝的權威更是連江南豪族也不得不懾服，<sup>51</sup>因此效忠晉室者紛紛追隨南遷，南遷後亦時時以興復晉室為職志。《世說新語·言

<sup>47</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4，〈楊佺期傳〉，頁2200。

<sup>48</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47，〈傅玄傳附傅暢傳〉，頁1333。

<sup>49</sup> 《晉書·傅暢傳》載傅暢咸和五年（330）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傅詠的過江年代並不是很清楚。唐·房玄齡等，《晉書》，卷47，〈傅暢傳〉，頁1333。《宋書·傅弘之傳》載傅暢「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清楚的記載傅洪是在後趙亡亂後南渡，傅詠與傅洪是兄弟或同一人之誤，並不是很清楚。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8，〈傅弘之傳〉，頁430。張亞軍把傅詠與傅洪當成不同的兩人，但把傅洪子傅詔認為傅詠子，恐有誤；安朝輝亦認為傅詠與傅洪是不同的兩人，傅詠在西晉末渡江。參見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南陽師範學院學報》，5：8（南陽，2006.8），頁61-69；安朝輝，〈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25。

<sup>50</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6，〈王懿傳〉，頁1390-1391。

<sup>51</sup>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第二部第四章〈東晉貴族制の確立過程—軍事的基础の問題と関連して—〉，頁211-256。該書有徐谷芄、李濟滄合譯的中譯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語篇》載：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sup>52</sup>

在這種興復晉室的時代氛圍中，那些第一時間未隨從晉室南遷，甚至仕於偽朝者，其忠誠度當然受到質疑，也因此有人要特意表忠，如《晉書·盧諶傳》載：

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sup>53</sup>

不論如何，對東晉朝廷而言，早渡僑人才是政權可靠的核心，晚渡者只是來路可疑的外來者。因此不論晚渡者身屬何等高門，若涉仕偽朝，忠誠度都有問題，其門第自然已非昔比。

仕宦以外，晚渡者還有「婚姻失類」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族一家的門第高卑，婚姻乃是重要標準，<sup>54</sup>尤其是兩晉時期門第婚姻更是處於發展凝固化階段，<sup>55</sup>大抵高門貴胄，頻通婚姻，合黨連群，專宰朝政。<sup>56</sup>這種講究門第、限制身分階層內部自我婚配的婚姻制度，可稱之為「身分性的內婚制」，<sup>57</sup>士族如果不嚴守這種內婚限制，便會受到本階層的嚴厲譴責。如南齊時高門王源

<sup>52</sup> 劉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見於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上卷，〈言語第二〉，頁92。

<sup>53</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44，〈盧欽傳附盧諶傳〉，頁1259。

<sup>54</sup> 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63。

<sup>55</sup> 趙志堅，〈魏晉南北朝的門第婚姻〉，《歷史教學》，1997：8（天津，1997.8），頁6；李金河，〈門第婚姻的發展及其畸變〉，收於氏著，《魏晉隋唐婚姻形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35-68。

<sup>56</sup> 王伊同，《五朝門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頁193。

<sup>57</sup> 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頁600-621。

與庶族富人滿氏聯婚，被沈約彈劾「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王、滿連姻，實駭物聽」，奏請免官，「禁錮終身」。<sup>58</sup>另如前述楊佺期的「婚宦失類」，史料未見其聯婚記載，《資治通鑑》胡三省注楊佺期「與僮荒為婚」，<sup>59</sup>不知何據，然而當時華北各胡族政權莫不擢用漢人豪族，許多漢族士大夫也為自身生存不得不與胡族政權合作，<sup>60</sup>北魏拓跋氏更利用婚姻拉攏漢人豪族，<sup>61</sup>因此當可推測五胡政權之下胡漢聯婚在所難免，<sup>62</sup>「晚渡北人」的「婚姻失類」，對象也有可能包括「非我族類」的胡族，如此則純正血統已失，何能再維持舊時門第？這也應是晚渡者被另分族類的重要時代背景。

綜而言之，「晚渡北人」的概念乃形成於東晉政權已進入穩定的東晉中期，這批最初的「晚渡北人」，亦即後趙敗亡、桓溫北伐失利之後的第三階段南渡者，多屬胡族政權瓦解之後「晚過江」的新難民，被早渡的僑姓第二代人物蔑稱之為「僮荒」或「荒僮」。此概念之所以產生，一方面是由於東晉政權成立已近半世紀，早渡的僑姓第二代人物既坐擁父輩所傳的北方文化正統，同時也漸習南方文化，他們以江左為新中原，而鄙視留在江北甚或淮北的晚渡者；另一方面，更由於這些晚渡者曾留居淪陷地區，受胡族政權的統治，甚至出仕胡族「偽朝」或與胡族聯婚，即所謂「婚宦失類」，不但政治忠誠度受質疑，也違背當時的門第文化，而這恐怕才是「晚渡北人」被另分族類且拒於權力核心之外

<sup>58</sup> 梁·沈約，〈奏彈王源〉，收於清·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卷27，頁301-302。

<sup>59</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10，〈晉紀32〉隆安二年條，頁3475。

<sup>60</sup> 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4），頁147-178；尹建東，《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東豪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頁127-132。

<sup>61</sup> 遼耀東，《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第五章〈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頁159-236。該文原載《新亞學報》，7:1（香港，1965.2），頁135-214。

<sup>62</sup> 《晉書·石季龍載記》載有「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即石虎納漢族柳耆女為貴嬪，所謂「婚宦失類」當如此類。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07，〈石季龍載記〉，頁2785。

更重要的原因。

#### 四、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動向

如上所述，東晉中期第三階段南渡者，即屬「晚過江」，而在此之後南渡者也都可稱之為「晚渡北人」，那麼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在人數上應不在少數，這批人在東晉時期的動向，應再全面追察。茲檢索東晉南朝史書，將東晉中期至東晉末年南渡的「晚渡北人」列一簡表，以資討論。

表一 史書所見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

號次	姓名	籍貫	南渡時間或出身	親族	東晉時期最高任官	出處
1	傅洪	北地泥陽	父傅暢仕石勒，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	祖傅祗 父傅暢		《宋書》卷 48，頁 1430
2	傅弘之	北地泥陽	祖傅洪，晉穆帝永和中南渡。	祖傅洪	西戎司馬 寧朔將軍	《宋書》卷 48，頁 1430
3	王洽	？	石季龍冠軍將軍，晉穆帝時來降。			《晉書》卷 69，頁 1835
4	劉波	彭城	初為王洽參軍，及季龍死，與王洽俱降。	祖劉隗	冠軍將軍 散騎常侍	《晉書》卷 69，頁 1835
5	吉挹	馮翊蓮芍	永和 10 年（354）桓溫北伐軍於灞上時南降。		員外散騎 侍郎 輕車將軍	《晉書》卷 89，頁 2319
6	楊亮	弘農華陰	永和 12 年（356）降投桓溫。	父楊林	梁州刺史	《晉書》卷 84，頁 2200
7	楊佺期	弘農華陰	隨父楊亮渡江。	父楊亮	雍州刺史	《晉書》卷 84，頁 2200
8	單道開	敦煌	後趙末南渡許昌……升平三年（359）至京師。			《晉書》卷 95，頁 2429
9	盧循	范陽涿縣	後趙亡後，盧勛南渡。	曾祖盧謚 祖盧勛		《晉書》卷 100，頁 2634
10	孫恩	琅邪	東晉中期（？）	孫秀族人		《晉書》卷 100，頁 2631

11	張天錫	安定烏氏	苻堅大敗於淮淝時來歸。	祖張軌	散騎常侍涼州刺史	《晉書》卷86，頁2252
12	袁 羆	京兆杜陵	苻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			《魏書》卷45，頁1011
13	王鎮惡	北海劇	苻秦亡後，客居荊州。	祖王猛	安西司馬征虜將軍	《宋書》卷45，頁1365
14	王 懿	太原祁	晉太元末(390-396)，徙居彭城。	父王苗事後秦苻堅	劉裕太尉府諮議參軍	《宋書》卷46，頁1390
15	垣 遵	略陽桓道	義熙五年(409)，劉裕圍廣固，來降。		劉裕太尉府行參軍	《宋書》卷50，頁1448
16	申 永	魏郡魏	義熙六年(410)，劉裕平廣固，來歸。	族人申宣、申恬	青、兗二州刺史	《宋書》卷65，頁1723
17	劉 昶	平原	劉裕北伐引用之		員外常侍	《南齊書》卷27，頁499
18	裴先福	河東聞喜	義熙末來降	裴徽之後	滎陽太守	《南齊書》卷51，頁869
19	王 氏	京兆霸城	王世弼祖父，隨劉裕南遷	孫王世弼		《魏書》卷71，頁1588
20	杜 坦	京兆杜陵	劉裕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	高祖杜預	青、冀二州刺史	《宋書》卷65，頁1720
21	陰 襲	武威姑臧	義熙末隨劉裕南遷			《梁書》卷46，頁645
22	薛弘敞	河東汾陰	東晉末避地襄陽			《周書》卷38，頁683
23	席 衡	安定	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		建威將軍	《周書》卷44，頁768
24	韋 肅	京兆杜陵	劉裕入關中，隨劉義真渡江		豫州刺史	《魏書》卷45，頁1012
25	褚 ？	河南陽翟	晉末，遷居江左	褚該先祖		《周書》卷47，頁849
26	王 康	北海劇人	劉裕入關中，來奔	王猛之孫王鎮惡弟	相國行參軍	《宋書》卷45，頁1371

從上表可以縱觀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政治境遇有以下幾

點特色。

第一，相對於早渡僑姓人物在《晉書》中有大量的列傳，「晚渡北人」在《晉書》中有列傳的只有寥寥數人。參照前述東晉時期的南遷浪潮，早渡者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南遷者，而晚渡者包括第三階段至第五階段的南遷者，雖然早渡、晚渡兩者的人數未見明載，但應當不至如史書對兩者的記載般懸殊，因此史書對兩者人物記載量的差距，當是反映「晚渡北人」在東晉歷史上的地位，遠不能與早渡僑姓人物相提並論。

第二，史書有記載的「晚渡北人」，在東晉時期的官歷普遍不高。上表（1）至（10）屬於後趙亡後的第三階段南渡者及其後人，其中官歷較高者只有（4）劉波官至冠軍將軍、散騎常侍，（6）楊亮官至梁州刺史，（7）楊佺期官至雍州州刺史，其他未見任官或只任小官；（11）至（14）屬於淝水戰後的第四階段南渡者，其中官歷較高者有（11）張天錫官至散騎常侍、涼州刺史，（13）王鎮惡東晉末本只任小縣令，劉裕引用後官至安西司馬、征虜將軍，（14）王懿也是劉裕引用後官至劉裕太尉府諮議參軍；（15）至（26）屬於東晉末劉裕北伐後的第五階段南渡者，其中在東晉末官歷較高者有（15）垣遵官至劉裕太尉府行參軍，（16）申永官至青、兗二州刺史，（24）韋肅官至豫州刺史，（26）王康官至劉裕相國行參軍。整體言之，東晉時期「晚渡北人」可查的最高官歷，為中央的散騎侍郎或地方的州刺史，未見能擠進中樞的文武將相，其宦途之不遇清楚可見。值得注意的是，要等到東晉末年劉裕竄起後，第四階段南渡的王鎮惡、王懿始被重用，至於東晉末年第五階段南渡者，其官途更要到南朝時期才得有所發展。

第三，雖然史書很少記載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仍然可看到數例「晚渡北人」遭受壓抑的記載。「晚渡北人」之門地本亦紛歧，有高門亦有寒族，寒族之低下者本即難於見諸史傳，值得留意者是原本高門南渡後卻被視同寒族而遭受到打壓。如前所述，弘農華陰高門楊亮，其家族「值亂沒胡」，楊亮曾出仕「偽朝」，

後來投降桓溫，官歷最高只到梁州刺史，其子楊佺期「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因此楊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雖然屢建軍功而官位只至地方太守，後來他投效荊州刺史殷仲堪與桓玄為敵，隆安三年（399）桓玄舉兵來攻，楊佺期卻被殷仲堪出賣，與其兄楊廣皆兵敗被殺，「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sup>63</sup>這是史書所見東晉時期「晚渡北人」中出身高門而遭受壓抑最好的例子。

又如淝水戰後來歸的張天錫也是一個例子。《晉書·張天錫傳》載：

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397-401）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sup>64</sup>

按張天錫祖張軌為前涼開國者，為永嘉亂後割據河西的漢族名門，前涼亡於前秦後，張天錫以亡國之君受苻堅禮遇，淝水之戰時天錫以苻融征南司馬來降，東晉任其為散騎常侍，拜金紫光祿大夫，似受尊寵，朝士卻「多共毀之」，以致形神昏喪，甚至被司馬元顯戲弄，直到桓玄當權，「欲招懷四遠」，才想借用其對涼州的影響力，任他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

另外《周書·薛澄傳》載有河東汾陰薛氏在江左遭受不遇之例：

<sup>63</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4，〈楊佺期傳〉，頁2200-2201。按楊佺期「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自云一詞易被懷疑其真實性，不過由於其父祖世系史書有清楚記載，學界較少懷疑其真實性，參見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31：1-4（東京，1958.11），頁613-643；最近出版的《駿台史學》，第144號（東京，2012.3）有「弘農（華陰）楊氏をめぐる總合的研究」特集，可參見其中二文：田中由起子〈弘農楊氏系圖〉，頁1-16；落合悠紀，〈後漢末魏晉時期における弘農楊氏の動向〉，頁81-105。

<sup>64</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6，〈張天錫傳〉，頁2252。

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既羈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愷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縻裾數參吏部？」愷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sup>65</sup>

按河東汾陰薛氏可能是原蜀地的土著強宗，蜀漢滅後蜀地強宗與客居宦族大量被遷往河東，薛氏是其中力量最強，影響力最大的一支，<sup>66</sup>雖然未必能與漢族高門並列，但亦可謂「門地非下」，東晉末年薛弘敞「率宗人避地襄陽」後，未見其族人在官場上有何重要的表現，史云「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既羈旅，不被擢用」，顯示直到薛愷時，其族人仍不得志，可見「晚渡北人」遭受歧視乃是東晉南朝相沿之傳統舊習。

《宋書·杜驥傳》更清楚地記載此一傳統舊習：

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劉裕）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劉義隆）元嘉（424-453）中，任遇甚厚……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sup>67</sup>

按杜氏本為「中華高族」，杜坦高祖杜預為西晉滅吳之功臣，永嘉

<sup>65</sup>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38，〈薛愷傳〉，頁683。

<sup>66</sup> 許蓉生、林成西，〈河東薛氏研究——兩晉南北朝時期地方豪強的發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版》，25：11（成都，2004.11），頁300-306。

<sup>67</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65，〈杜驥傳〉，頁1720-1720。

喪亂，杜氏避難河西，仕於前涼，苻堅平涼州，始還關中，待劉裕入關中，杜坦乃率族人隨從南遷，<sup>68</sup>其後杜坦雖受宋文帝重用，卻由於當時有「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儉荒遇之」的傳統，「每為清塗所隔」，因而慨嘆不已，甚至當面向宋文帝抱怨，結果宋文帝也只能「默然」。這雖然是南朝劉宋時代的例子，但也可說明「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儉荒遇之」已成東晉以來的傳統舊習，雖皇帝亦難以撼動。

第四，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既然普遍遭受到壓抑，自然就會有不甘受壓抑者尋求各種機會圖謀發展，而當時混亂的政局，正提供他們圖謀發展的機會。在淝水戰後不久，謝安引退，朝政落入孝武帝之弟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手，孝武帝雖與司馬道子聯手擴張皇權，但主相之間仍多猜忌，待孝武帝死後，安帝繼位，司馬道子與司馬元顯父子專掌朝政，從而引發手握州鎮重兵的門閥士族王恭、殷仲堪、桓玄等的起兵對抗，而這些門閥士族彼此又互相牽制，形成更加混亂的政局，而這正是「晚渡北人」圖謀發展的絕好時機。前述楊佺期投效荊州刺史殷仲堪並與桓玄為敵，史書即載是「欲因事際以逞其志」，結果雖然兵敗被殺，但已隱約可見「晚渡北人」中不乏力求崛起者。

孫恩、盧循之變亂，也是「晚渡北人」力求崛起的一個事例。孫恩是瑯邪人，西晉中書令孫秀之後，世奉五斗米道，孝武帝太元（376-396）末年，孫恩叔父孫泰，因私集徒眾密謀反晉，事洩被殺，孫恩率眾逃入海島。隆安三年（399），司馬元顯為擴充兵力，徵發三吳地區「免奴為客者」充兵役，引發三吳世族平民的不滿，孫恩趁機起兵，「旬日之中，眾數十萬」，<sup>69</sup>朝廷最後依靠劉裕率領的北府兵平定變亂。孫恩失敗自殺後，其餘黨推舉孫恩妹夫盧循為首，盧循一度接受朝廷招安，至義熙六年（410）利用劉裕北伐南燕再起兵，次年仍被劉裕鎮壓，兵敗自殺。這次動

<sup>68</sup> 王力平認為隨劉裕南遷的是杜坦、杜驥兄弟的父親，參見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統變遷》，頁70-71。

<sup>69</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00，〈孫恩傳〉，頁2632。

亂歷時十餘年，可說是漢末以來江南最大的動亂，不但江南經濟遭受摧毀，僑、吳士族亦受到重大的打擊。<sup>70</sup>

陳寅恪曾論孫恩、盧循的身世，指出他們都因五斗米道世家而聯婚，<sup>71</sup>田餘慶更進一步考察，指出孫秀後人何時南渡，史籍無徵，盧循為盧諶之後，祖盧勗在後趙亡後渡江，孫恩、盧循應都是晚渡北人之後，同奉道教又共為婚家，屈居次等士族，同有突破門閥政治限制的要求，他們先是力求憑借道術躋身門閥士族政治行列之中，失敗後轉而利用聚集的道教信徒乘時舉兵，因此孫恩、盧循的變亂，可說是次等士族對門閥士族的一種反抗。<sup>72</sup>換言之，孫恩、盧循之變亂亦是「晚渡北人」力求崛起的一個事例。

另外，東晉末年劉裕崛起，不少「晚渡北人」投效在劉裕麾

<sup>70</sup> 關於孫恩、盧循之亂，基本史料是《晉書·孫恩、盧循傳》，馮君實撰，《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北京：中華書局，1968）可詳參，另外學界也有很多研究，限於篇幅，非關本文主旨者不擬詳述，請參見：蕭耦，〈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起義〉，《文史哲》，1955：12（濟南，1955.12），頁31-42；曹永年，〈試論東晉末年農民起義的變質〉，《歷史研究》，1965：2（北京，1965.4），頁43-58；楊偉立，〈關於孫恩盧循起兵的性質〉，《歷史教學》，1963：5（天津，1963.5），頁34-38、43；宮川尚志，〈孫恩·盧循の亂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0：2-3（京都，1971.12），頁1-30；宮川尚志，〈孫恩·盧循の亂に関する補考〉，收於《鈴木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學論叢》（東京：明德出版社，1972），頁533-548；朱大渭，〈孫恩徐道覆起義的性質及其歷史作用〉，收於氏著，《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357-401；砂沢洋子，〈「孫恩·盧循の亂」について〉，《史艸》，14號（東京，1973.11），頁75-94；陸樹慶，〈試論東晉末年孫恩盧循起義〉，《中州學刊》，1980：2（鄭州，1980.6），頁96-103；萬繩楠，〈五斗米教與孫恩起兵〉，《江淮論壇》，1981：5（合肥，1981.10），頁53-57；小林岳，〈孫恩·盧循の亂における海島の再検討〉，《史觀》，109（東京，1983.9），頁14-28；柯發根，〈孫恩盧循起義的社會階級基礎及其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1（北京，1983.3），頁73-82；關治中、王克西，〈也論東晉末年孫恩集團的性質〉，《西北大學學報》，1988：4（西安，1988.12），頁103-108。

<sup>71</sup>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見《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頁370-375。唐長孺認為孫秀所奉的可能不是五斗米道而是太平道；胡寶國認為，孫恩家族是在東晉中期南渡後，才受南方文化影響而信奉天師道的，暫不論孰是孰非，附記於此。見〈太平道與天師道〉，收於氏著，《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750-751；前引胡寶國，〈晚渡北人與東晉中期的歷史變化〉，頁108-111。

<sup>72</sup>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310-317；楊偉立、曹永年、宮川尚志也都強調孫恩、盧循具有失意的晚渡僑遷士族的身分，參見楊偉立，〈關於孫恩盧循起兵的性質〉，頁38；曹永年，〈試論東晉末年農民起義的變質〉，頁45-46；宮川尚志，〈孫恩·盧循の亂について〉，頁5。

下，尋求發展，如前秦苻堅謀主王猛之孫王鎮惡，《宋書·王鎮惡傳》載：

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劉裕），時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為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sup>73</sup>

按王鎮惡苻秦亡後客居荊州，以其門地與才華，在東晉末年僅官拜小縣令，劉裕引用後，成為北伐中的一員大將，這是「晚渡北人」投效劉裕而崛起的顯著事例。又如太原祁縣人王懿，「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為二千石」，王懿晉太元末（396）徙居彭城，早渡的同族王愉正當貴盛，「當時莫比」，<sup>74</sup>乃赴江南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見桓玄不足於成大事，乃改投效劉裕，後來成為劉裕太尉府諮議參軍，亦為北伐中的一員大將。<sup>75</sup>又如傅暢子傅洪於後趙亡後南渡，其子傅韶為梁州刺史，孫傅弘之在東晉末年仕途不遂，後亦投效劉裕，成為北伐時的一員大將。<sup>76</sup>京兆杜陵人韋羆，「為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為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未見任官，後來「仕劉裕為輔國將軍、秦州刺史」，<sup>77</sup>應該也是在東晉末年投效劉裕才有所發展。

綜而言之，「晚渡北人」在《晉書》中有傳者只有寥寥數人，他們在東晉時期的最高官歷為中央的散騎侍郎或地方的州刺史，未見能躋進中樞的文武將相，同時史書還載有不少「晚渡北人」在東晉政壇上受到打壓的例子。至東晉後期，長期遭受到壓抑的「晚渡北人」已是一股蓄勢待發的反抗勢力，而當時混亂的政

<sup>73</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5，〈王鎮惡傳〉，頁1366。

<sup>74</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75，〈王愉傳〉，頁1970。按王愉曾祖王承西晉末南渡，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

<sup>75</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6，〈王懿傳〉，頁1391。

<sup>76</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8，〈傅弘之傳〉，頁1430-1431。

<sup>77</sup> 北齊·魏收，《魏書》，卷45，〈韋閔傳〉，頁1011。

局，正提供他們發展的良機，不過最後只有部分投效劉裕者才成功有所發展。

## 五、東晉時期「晚渡北人」不遇的原因

「晚渡北人」在東晉政壇上的不遇，乃是由許多複雜的因素所構成的，每個案例的因素也不盡相同，而本文第三節論述「晚渡北人」被另分族類的因素，也是他們在政壇上不遇的原因，以下再綜合述論之。

首先，南北文化上的差異，使得晚渡者被視為文化上的落伍者。何啓民認為，永嘉之亂後留在北方的中原士族，多為保持傳統經學的舊閥閱者，而南下的是那些受過新時代新思潮即玄學洗禮的家族。<sup>78</sup>田餘慶亦指出，永嘉之亂後，北方族大宗強的舊族門戶，往往不肯輕易南行，如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弘農楊氏，這些舊族門戶門風較保守，多以儒學傳家而不重玄學，決心過江的士族，則多為東海王司馬越府聚集的名士，崇尚玄風。<sup>79</sup>並且，東晉初年王導在江南又大力提倡清談玄學，使得玄學新思潮在江南生根，<sup>80</sup>成為當時的主流文化。如此，南北文化的差異逐漸擴大，讓晚渡者似乎成為新思潮的落伍者。不僅如此，晚渡者歷經胡族統治，又涉險南遷，使他們多有尚武之風，或帶點武人的氣息，如楊佺期兄弟「皆粗暴強」，<sup>81</sup>王鎮惡「頗讀諸子兵書」、「意略縱橫，果決能斷」，被劉裕譽為「所謂將門有將也」，<sup>82</sup>王懿兄王「果敢有智略」，<sup>83</sup>《宋書·傅弘之傳》載：

弘之素善騎乘，高祖（劉裕）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

<sup>78</sup> 何啓民，〈五胡亂華時期的中原郡姓〉，收於氏著，《中古門第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78），頁245-286。

<sup>79</sup> 田餘慶，〈後論〉，收於氏著，《東晉門閥政治》，頁330-331。

<sup>80</sup> 何啓民，《魏晉思想與談風》，頁189-196。

<sup>81</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4，〈楊佺期傳〉，頁2200。

<sup>82</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5，〈王鎮惡傳〉，頁1365-1366。

<sup>83</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6，〈王懿傳〉，頁1391。

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sup>84</sup>

另一方面，享受各種優遇特權的早渡僑姓，浸身於江南貴族文化，視這批帶有武人氣息的晚渡者粗鄙無文，因而仿效吳人口吻，視晚渡者為「荒僮」。總之，南北文化上日益擴大的差異，使得晚渡者難於在江南貴族文化圈內發展。

其次，前面已論述的「婚宦失類」問題，成為「晚渡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壓的最好藉口。正如前述，「晚渡北人」因留在北方淪陷區，仕宦於胡族「偽朝」，甚或與胡族聯姻，普遍有「婚宦失類」的問題。仕宦於胡族「偽朝」，政治忠誠度受到質疑，違背士族內婚制或與胡族聯婚，則違背當時的門第文化，這都使得「晚渡北人」難於維持舊時門第，而在官場上遭受打壓。此點前面已有詳論，不再贅述。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政治權力集團的分野，更讓晚渡者無緣擠進統治核心。田餘慶考察東晉僑姓門閥士族的來源，指出永嘉亂後過江的士族，多為八王之亂後期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對峙時，屬於東海王越陣營的名士，他們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與東海王越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估計過江後在建康朝廷立足對其較有保障。而東海王越由於王國地境所在和活動範圍所及的原因，其所團聚的士族名士大抵為黃河以南諸州人，而且多為新出的門戶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隸青、徐、兗、豫諸州，且由於成都王穎曾與劉淵、石勒結盟，致使兩京淪陷，因此東晉始終維持與前、後趙敵對的狀態。<sup>85</sup>

田餘慶此說頗富啟發，茲以河東裴氏論之，河東裴氏在曹魏西晉時為與王氏相比的盛門高族，史載「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sup>86</sup>然而永嘉亂後裴氏受到嚴重打擊，屬司馬越陣營者，如裴遐、裴盾、裴邈、裴邵多因戰禍身亡而難

<sup>84</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48，〈傅弘之傳〉，頁1430-1431。

<sup>85</sup> 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東晉門閥政治》，頁27-37、〈後論〉，頁330-331；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楊家駱主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18，〈晉穆帝永和七年〉條，頁370。

<sup>86</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35，〈裴秀傳〉，頁1052。

成行，其他或遠走河西，或北投慕容氏，四散飄零，而部分與司馬越陣營疏遠的裴氏族人南渡後，已非名家，難入望族，以至整個東晉時期，名著西晉的河東裴氏竟然寂默無聞。<sup>87</sup>又以京兆杜氏論之，京兆杜氏亦為魏晉高門，杜幾被曹操重用，杜預娶司馬懿女，又為滅吳功臣，使杜氏達於頂盛。永嘉喪亂後，杜預孫杜乂隨晉王室南渡，「有盛名於江左」，「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楊丞」，<sup>88</sup>其女又為成帝恭皇后，與帝室再度聯姻，使杜氏仍能維持名門。然而杜氏另一支，即杜坦、杜驥兄弟直到東晉末才南渡者，被視為晚渡北人，直到劉宋時仍被壓抑。<sup>89</sup>

再觀諸東晉的「晚渡北人」大多不屬於先前東海王司馬越的名士集團，甚至是來自與此集團長期對立的陣營，如盧循先祖盧志本是成都王穎的死黨，盧諶又曾仕於後趙石氏，其子盧勗於後趙亡後南渡，凡此種種都使盧氏子孫無緣進仕建康；<sup>90</sup>傅洪父傅暢曾仕於石勒，<sup>91</sup>王洽、劉波曾仕於石虎；<sup>92</sup>楊佺期父楊亮，「少仕偽朝」，<sup>93</sup>都有類似的問題，亦即不僅止是仕奉胡族的問題，而且牽涉到敵對的政治派閥問題，即或未見敵對關係，但與東海王越名士集團無歷史淵源者，亦難見用，如孫恩先人孫秀乃趙王倫的心腹，「威權振於朝廷」，<sup>94</sup>然而晚過江的孫氏族人，直到東晉末年仍寂默無聞；<sup>95</sup>其他許多晚渡者在政壇上的不遇，大多類此。

縱觀中國歷代政權之建立，往往有其統治核心集團，如眾所周知的後漢南陽集團、隋唐關隴集團，不屬於此集團者，大多只

<sup>87</sup> 韓樹峰，〈河東裴氏南遷述論〉，《中國史研究》，1996：2（北京，1996.6），頁96-103；宋艷梅，〈兩晉之際河東裴氏播遷考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5：1（洛陽，2007.2），頁13-17

<sup>88</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93，〈杜乂傳〉，頁2414。

<sup>89</sup> 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統變遷》，頁59-60；劉靜夫，〈京兆杜氏研究——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個案研究之二〉，《許昌師專學報》，1993：3（許昌，1993.9），頁17-25。

<sup>90</sup> 田餘慶，〈劉裕與孫恩——門閥政治的「掘墓人」〉，《東晉門閥政治》，頁312-313。

<sup>91</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47，〈傅暢傳〉，頁1333。

<sup>92</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69，〈劉波傳〉，頁1838。

<sup>93</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4，〈楊佺期傳〉，頁2200。

<sup>94</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95，〈趙王倫傳〉，頁1600。

<sup>95</sup> 田餘慶，〈劉裕與孫恩——門閥政治的「掘墓人」〉，《東晉門閥政治》，頁310-311。

能居於權力邊緣，仕途往往難於順遂，東晉政權由東海王越名士集團派生的僑姓高門所把持，不屬於此集團的「晚渡北人」，其在政壇上的不遇，也就不難理解了。

## 七、結語

西晉末年政局動亂，人民四處流散，尤其永嘉亂之後，華北難民如潮水般南渡，直到南朝時期，較大規模的南遷浪潮，可約略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永嘉喪亂後，第二階段是在蘇峻之亂後，第三階段是在後趙敗亡、桓溫北伐失利之後，第四階段是在淝水之戰後，第五階段是在劉裕北伐後，第六階段是在劉宋與北魏交戰後。「晚渡北人」的概念大約是形成於東晉中期，亦即第三階段之後南渡者，即被當時人歸類為「晚渡北人」。

東晉中期，政權已進入穩定，早渡僑人已完成「求田問舍」，把持政經特權，此時後趙敗亡、桓溫北伐失利，引發新一波的難民潮，他們被稱之為「晚渡北人」，甚至被早渡的僑姓第二代人物蔑稱之為「僞荒」或「荒僞」。這一方面是由於早渡的僑姓第二代人物已漸習南方文化，他們以江左為新中原，鄙視留在江北甚或淮北的晚渡者，另一方面，更由於這些晚渡者曾留居淪陷地區，受胡族政權的統治，甚至出仕胡族偽朝或與胡族聯婚，即所謂「婚宦失類」，不但政治忠誠度受質疑，也違背當時的門第文化，因而被另分族類。

「晚渡北人」在東晉政權中並不得志。《晉書》中有傳的「晚渡北人」寥寥可數，且在東晉時期的最高官歷不過為中央的散騎侍郎或地方的州刺史，未見能躋進政權中樞，而史書還載有不少他們在東晉政壇上遭受到打壓的例子。長期受到壓抑的「晚渡北人」至東晉後期已蓄勢待發，圖謀翻身，而當時混亂的政局正提供他們有利機會，不過只有部分投效劉裕者最終才成功有所發展。

「晚渡北人」之所以在東晉政壇上不遇，乃是由許多因素所構成。首先，南北文化上的差異，使得晚渡者被視為文化上的落

伍者，難於在江南貴族文化圈內發展。其次，「婚宦失類」的問題，成為「晚渡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壓的最好藉口。最後，更值得注意的是，東晉僑姓門閥士族的來源，多為八王之亂後期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對峙時屬於東海王越陣營的名士集團，非此集團出身者難於躋進東晉的權力高層，「晚渡北人」大多不屬於此一集團，甚至是來自與此集團長期對立的陣營，因此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在政壇上的不遇，也就不難理解了。

「晚渡北人」在政壇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要在時空環境都有重大變動的南朝時期，囿於篇幅，擬另文再論。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史料

-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姚思廉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楊家駱主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清·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 二、近人著作

#### (一) 專書

-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  
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尹建東，《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東豪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統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王心揚，《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王伊同，《五朝門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朱大渭，《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3。  
何啓民，《魏晉思想與談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1967。

何啟民，《中古門第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7。

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

李金河，《魏晉隋唐婚姻形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4。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長孺，《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

遼耀東，《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馮君實，《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北京：中華書局，1968。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二）論文

小林岳，〈孫恩・盧循の亂における海島の再検討〉，《史觀》，109（東京，1983.9），頁 14-28。

中村圭爾，〈東晉時期揚州的流民問題及其歷史意義〉，收於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76-187。

方高峰，〈兩晉南朝時期北方流民南下與南北漢人融合述論〉，《西北師大學報》，44：4（蘭州，2007.7），頁 99-103。

田中由起子，〈弘農楊氏系圖〉，《駿台史學》，144（東京，2012.3），頁 1-16。

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

- 第 31 卷第 1-4 號（東京，1958.11），頁 613-643。
- 安朝輝〈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 余嘉錫，〈釋儵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下冊（南京，1948.12），頁 47-52。
- 呂春盛，〈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 77-110。
- 宋艷梅，〈兩晉之際河東裴氏播遷考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5：1（洛陽，2007.2），頁 13-17
- 李天石，〈蕭衍雍荊軍事集團的形成及其覆齊建梁的成功〉，《東南文化》，1998 年增刊 2（南京，1998），頁 119-123。
- 李天石，〈蕭衍覆齊建梁考論〉，《江蘇社會科學》，1999：2（南京，1999.3），頁 109-115。
- 李金河，〈門第婚姻的發展及其畸變〉，收於氏著，《魏晉隋唐婚姻形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35-68。
- 板尾典隆，〈梁代の政治と「晚渡北人」〉，《龍谷大學大學院研究紀要・人文科學》，15（京都，1994.1），頁 217-219。
- 柯發根，〈孫恩盧循起義的社會階級基礎及其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1（北京，1983.3），頁 73-82。
- 砂沢洋子，〈「孫恩・盧循の亂」について〉，《史艸》，14 號（東京，1973.11），頁 75-94。
- 胡寶國，〈晚渡北人與東晉中期的歷史變化〉，《北大史學》，14（北京，2009.12），頁 94-111。
- 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53-63。
- 唐長孺，〈太平道與天師道〉，收於氏著，《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750-751。
- 夏日新，〈永嘉亂後北方民戶的大流徙〉，《社會科學》，1989：6（蘭州，1989.12），頁 95-100。
- 孫志剛、張琳，〈東晉南朝源出流民的情況及其原因分析〉，《青海

- 師專學報》，2008：5（西寧，2008.10），頁 58-60。
- 宮川尚志，〈孫恩・盧循の亂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0：2-3（京都，1971.12），頁 1-30。
- 宮川尚志，〈孫恩・盧循の亂に關する補考〉，《鈴木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學論叢》（東京：明德出版社，1972），頁 533-548。
- 馬曉瓊，〈東晉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響〉，《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5：6（樂山，2010.6），頁 94-97。
- 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南陽師範學院學報》，5：8（南陽，2006.8），頁 61-69。
- 張琳，《東晉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問題》，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 曹永年〈試論東晉末年農民起義的變質〉，《歷史研究》，1965：2（北京，1965.4），頁 43-58。
- 許蓉生、林成西，〈河東薛氏研究—兩晉南此朝時期地方豪強的發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版》，25：11（成都，2004.11），頁 300-306。
- 陳琳國，〈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4（北京，1991.8），頁 20-27。
- 陸樹慶，〈試論東晉末年孫恩盧循起義〉，《中州學刊》，1980：2（鄭州，1980.6），頁 96-103。
- 越智重明，〈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軍事史學》，9（東京，1967.5），頁 21-41。
- 黃云，〈魏晉流民及流民策〉，《福州師專學報》，21：6（福州，2001.12），頁 68-71。
- 楊洪權，〈兩晉之際士族移徙與“門戶之計”淺論〉，《武漢大學學報》，1998：1（武漢，1998.2），頁 106-111。
- 楊偉立，〈關於孫恩盧循起兵的性質〉，《歷史教學》，1963：5（天津，1963.5），頁 34-38、43。
- 萬繩楠，〈五斗米教與孫恩起兵〉，《江淮論壇》，1981：5（合肥，1981.10），頁 53-57。

- 落合悠紀，〈後漢末魏晉時期における弘農楊氏の動向〉，《駿台史學》，144（東京，2012.3），頁 81-105。
- 趙志堅，〈魏晉南朝的門第婚姻〉，《歷史教學》，1997：8（天津，1997.8），頁 6。
- 劉雅君，〈論流民與兩晉之際的政治格局〉，《貴州文史叢刊》，2002：3（貴陽，2002.9），頁 12-16。
- 劉新光，〈晉永嘉亂後南遷流民地域選擇述論〉，《南京曉庄學院學報》，18：3（南京，2002.9），頁 31-36。
- 劉靜夫，〈京兆杜氏研究—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個案研究之二〉，《許昌師專學報》，1993：3（許昌，1993.9），頁 17-25。
- 蕭耦，〈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起義〉，《文史哲》，1955：12（濟南，1955.12），頁 31-42。
- 韓樹峰，〈河東裴氏南遷述論〉，《中國史研究》，1996：2（北京，1996.6），頁 96-103。
- 羅新，〈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收於陳少峰主編，《原學》第一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2），頁 147-175。
- 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15（北平，1934.6），頁 51-76。
- 關治中、王克西，〈也論東晉末年孫恩集團的性質〉，《西北大學學報》，1988：4（西安，1988.12），頁 103-108。

#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e Migrating Northerner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Cause for Not Meeting with Due Recognition

Leu, Chuen-sheng\*

## Abstract

In general, ethnic group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people of Chiao from the north, the people of Wu in the south and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such as "Man" and "Viet" in the south.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the people of Chiao held the ruling position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ever, there was one group from the people of Chiao, which was called "the late migrating northerners", having a unique social statu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late immigrants belonged to the people of Chiao, their social status was incomparab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ble Chiao and even lower than the noble Wu since they immigrated to the south far later than other groups. Although they suffered much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they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when and how the late migrating northerners arises as well as the cause for not obtaining due recognitio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Key words:**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hiao people, the Wu people, the late migrating northerners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